



从维熙 李辉 摄

纪念

我与老从的这些日子

□李辉

面对“回家”摄制组，他谈故乡、“反右”、劳改、平反等一系列的故事：

对对。这个手指头就是还没有进劳改队以前（受伤的），那时候我和王蒙全在西山改造，我们是在门头沟，王蒙和北京市委这批人全在那改造。在割草的时候，一下子我就砍到这个上面了，当时血就出来了，就把这根筋砍断了，所以永远（有伤）……曾经朋友来了我就说，手指就是我的一个生命符号。当然这已经成过去的往事了。

对了，寻寻根吧，寻寻根。这根的力量是很深远的，要（用）直白的话，很难加以解释。前年我回访问到老江河的时候，我直掉泪。小的时候到那洗澡，冬天挺冷的天，往那一跳，它那水是暖的，冬天都有小鱼在里面游。（现在）整个没有了。

景物已非昨日。就是故土难离啊！无论这个家多破，它毕竟是你的根，所以它总有欲念……梦里相思，我也是总难以割舍。

但是可能对父亲就没有什么太多的印象，因为太小了，没有一点印象。就好像《父与子》一样，所以四岁以前怎么会留下什么印象，不可能，这是我的悲哀。一直到我回来以后，我要出版的著作，有的出版社就要找父亲的照片，我问我妈妈。问完我母亲，她才把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缝在内衣口袋里的照片取出来了，她一直珍藏着我父亲青年时代的那张照片，穿着西服的，在北洋大学（拍摄的那张照片）。

你看这么多全是我乡亲，我都不认识，我离开代官屯的时候，也就十三四岁甚至更小。这间房子里呢，父亲什么样我没见过，但是他事实上是跟我母亲和我在这间房子里生活。

当时我父亲走了以后，就剩我母亲跟我孤儿寡母。

他还谈到了20年的沙场劳改：

什么我没干过？赶车、种庄稼、修水堤、割稻子、挖铁、制过坯造过砖、经营果园，我还管过桃树。那是我轻松的一段（日子），那个地方是可以参观的模范监狱，整个全是大葡萄园。我经营的是什么东西，我当那桃园班的班长，管着两百多亩桃树，所以我在卖的桃，我对它的品种啊怎么经营啊怎么剪枝施肥都门儿清。我总觉得我愧对了母亲，因为那时候文化大革命，非常残酷，她背着大牌子天天扫街，我的孩子有的时候心疼奶奶，他就经常拖过笤帚来替奶奶扫。母亲就在北京呆了一年多的安静时间，母亲（在我）四岁丧夫，历经坎坷，已经好（不）容易盼着儿子大了，工作了以后又来个政治灾难。对于一个女人在这个年代里带着一个孤零零的孙子，有多么艰难……

当1957年经历了那20年以后，童年的梦，甚至在年轻时所追随的梦，在你眼前破碎了。“文革”以后，就是说人生苦旅那种足迹尽量地在我心灵里面加以淡化，但是这个东西我是放不下的……我现在活到73岁了，它占了我将近20年的光阴，那能忘却吗？就等于人生四分之一的经历，所以我必须把它写出来，对历史，对良心负责，也对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负责），让他们留下自己的声音。

2014年夏天，《人民日报》文艺部与襄阳市委宣传部联系，邀请从维熙、钟紫兰夫妇和李延国、赵丽宏、刘庆邦等前往襄阳，做一场“汉水笔会”。

老从第一次走进襄阳，我们一起参观米公祠、隆中、丹江水库、武当山、汉中、安康等。

老从走进鹿门寺，他才知道这是孟浩然的读书之地，他在文章里写道：

我诙谐而幽默地说：“汉江圣水偏爱老人。你们都记得我们游汉水之畔大山之事吧。为了照顾采风团里年纪最大的我，专门开来一辆车，送我提前到了山上的鹿门寺。这儿是唐朝诗翁孟浩然少年读书之地，曾给后人留下《春晓》名诗。我从少年时就熟读此诗并因此激起文学梦想。当时虽然对孟浩然非常崇拜，但不知他就是襄阳人氏——能到他的故土，寻觅他的形影，内心十分激动……”

“你喝了那儿的的水了？”文友问我。

“让你猜着了，我喝了鹿门寺的水！”



从维熙(左)和作者合照

他说：“那也不能称其水为圣水呀？”  
“你听我说下去么。进了这个寺院，正好碰上一位僧人，用一只水桶在岩洞口提水。我向那位老僧说想喝上一口你打上来的水。那老僧把水桶放下双手合十对我说道：‘施主，这岩洞中之水，你们城里人怕是喝不惯吧？’我说：‘这鹿门山之水，理应属于汉江水系，我在南湖宾馆下榻时，已经喝过水龙头里的水了……’”



从维熙肖像 罗雪村 作

老僧绽放出一丝笑意，并没答应我的要求，而是用手指了指岩洞旁悬挂的另一只小小水罐，让我自己动手勺水。送我来鹿门寺的司机，抢先拿起水罐从岩洞里勺上水来，我一扬脖子喝了下去：“你想，千年前的诗圣孟浩然，在这儿耕读挥墨多年，一定喝过这洞中之水；现在寺院的僧侣们，又用其水制其禅食，称其为圣水，不是挺合适的吗！”

友人笑了，说了一句文学行话：“你真富有文人的想象力……”

——《义重情深的恩赐》

记得我从汉中返回襄阳，81岁高龄的老从，在告别晚宴上连声高歌，抒发一个文人难以忘怀的汉水情怀。

2016年4月，老从希望我能把他的文集推荐给河南文艺出版社。我马上与社长陈杰女士联系，《从维熙文集》很快就出版。2018年1月12日召开的发布会很轰动，当时来了很多人，刘文武、梁晓声都来了。老从喜欢喝酒，喜欢唱歌，当场我就请他用美声唱法为大家唱了一曲。他还朗诵了他的诗。现场听众都为之感动。

2018年4月初，我请毕飞宇参加活动，毕飞宇谈到他与老从在青海的故事：

老从，我们曾一起去青海参加活动。当时，除了我之外，我五岁的儿子最喜欢往老从身上爬。我儿子是很内向的。一个孩子对一个成人的选择是最精确的。用孩子的眼光、心，去选择的人，一定是值得尊敬的。

还有一个场景我一直没有忘记。老从是抽烟的，我也抽。老从的妻子钟紫兰是个医生，出于健康考虑，对老从抽烟是有限制的。所以，每次聚会，他都喜欢往我这里蹭，偷摸找同伴一起抽烟。

有一次，我们俩躲起来抽烟，在我们前面三四十米，太太们一起在那里聊天。老从右手夹烟，声音不高不低地说：“一辈子有了钟紫兰，可以了。”

我当时听了这话，特别感动。

且不管钟紫兰为这样一个老男人付出过多少，一个男人，没有油腔滑调，对着一个无关的人，表达内心坚定的爱，这很打动人。

不抒情，很坚定。

老从有发自骨子里的善。无论他处境怎样，他敏感的，念念不忘的，还是人性的善。人的善，与他内心的善相呼应，他内心有一种很厚实、博大的善。他坚定不移地坚守着那种善，无论生活如何对待，他永远用善的方法来看待。

男人的善，作家的善，溢于言表，挂在他脸上。所以一个懵懂的孩子会喜欢他，因为这种无障碍的善。这就对了，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作家。

我爱大叔老从；我爱大姐钟紫兰。

2019年6月，老从的夫人钟紫兰告诉我，老从患肺癌了，我听了心里十分难受。

前些日子，我去看望老从。

老从经常告诉我，巴金是他最敬仰、最崇拜的一棵大树。20世纪80年代，巴金培养了多少作家，从维熙、张贤亮、冯骥才、水运宪、张一弓、谌容、张辛欣……这一天，老从告诉我，要把《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捐赠给巴金故居。我一听，心里非常感动。把这部手稿珍藏至今的老从，将之赠送巴金故居，这是多么了不起的情怀！我回到家里，将手稿送给周立民，请他尽快做一个漂亮的精装本。

后来，我联系朝阳医院呼吸科的卜小宁大夫，老从终于走进医院，在那里逗留了一段时间。卜大夫说，她的父亲经常看从先生的作品。没有想到，10月29日早晨，老从离开了我们。

从维熙先生，1933年生于河北玉田代官屯，2019年10月29日离开我们，享年86岁高寿，一生也是圆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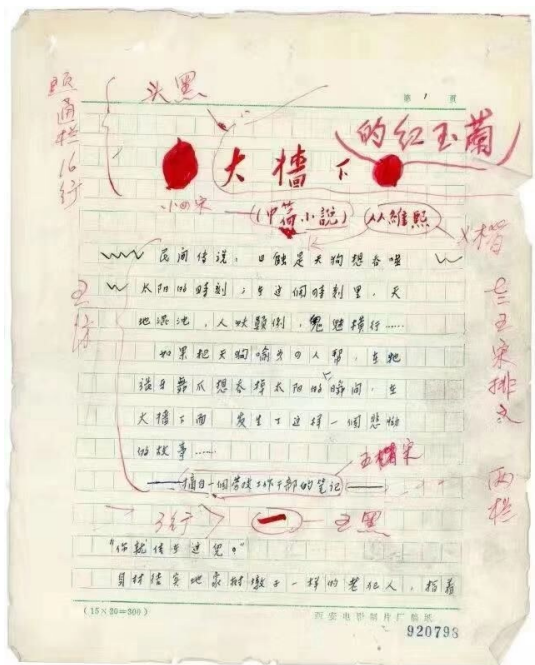
谨以此文，感怀从维熙先生。

我与从维熙1983年就认识了。我们在北京日报社，算是前后辈的关系。

老从与我也不是忘年交，他很愿意听我说，因为他知道我是爱护他的。有时候，他会给我打电话抱怨文章发不出来。我就劝他，跟着时代走，做有意义的事，没意思的事不做。

对被改造那段历史，老从感受很深，但是平时他谈起来往往很淡。老从的好处就是能拿得起、放得下。他也是一位很幸运的作家，能写出很好的作品。老从向来都是把苦难写出来了，就都过去了，没把这些当回事。因为这种乐观，所以有很好的生活品质。

“文革”结束后，从维熙获得平反，他写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就发表在巴金主编的1979年2月的《收获》杂志上。这部手稿，老从一直保留着。



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手稿

巴金百年诞辰之际，老从写了一篇感怀巴金的文章。对老从而言，巴金就是他敬仰、崇拜的一棵大树，如果没有巴金，老从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等作品就难以发表。巴金通读了这些作品，对老从、对“大墙文学”给予了极高评价。

在《巴金箴言伴我行——贺巴金九九重阳》文中，老从谈到：

那天，我将这部中篇小说的遭遇，讲给巴老和小林听了，并将其文稿交给了巴老和小林。据小林事后告诉我，巴老不顾长途飞行的疲劳，连夜审阅了我的小说，并对小林说了如下的话：“小说展示了历史的严酷，在严酷的主题中，展示了生活最底层的人性之美，不管别的刊物什么态度，我们需要这样的作品，回去我们发表它。”因而，这部遭到封杀的中篇小说，不久就在《收获》上发表了——事实证明巴老预言的准确，在1984年全国第二届小说评奖中，一度成为死胎的《远去的白帆》，以接近全票的票数，获得了该届优秀中篇小说文学奖。

过去我一直认为巴老年事已高，自己又埋头于创作，未必亲自过目《收获》的作品，事实证明我的认知错了，小林在电话中告诉我，许多重头作品，都是交巴老亲自过目后拍板发表问世的。当时巴老已年过七旬，不知疲惫地读上几万字的长卷，并不顾可能惹来的麻烦，将描写知识分子沉沦于苦难生活的作品披露于世，这本身就是对文学表现生活真实的张榜。其实，巴老从1978年写《真话集》开始，不仅写下讲真话的承诺，并身体力行行为写真实的作品鸣锣开道。记得，1979年夏天我应上影之邀，在上海改编《大墙下的红玉兰》电影剧本的时候，《收获》的一位编辑，去上影招待所与我谈起《收获》发表《大墙下的红玉兰》的情况时，就提到巴老对此“大墙文学”开山之作的态度：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召开，正是“两个凡是”与“实事求是”殊死一搏的日子，我寄来的这部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如果没有巴老坚决的支持，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怕是难以问世的——正是巴老义无反顾，编辑部才把它以最快速度在头条的位置发表出来。当时，我就曾设想，如果我的这部中篇小说不是投胎于巴老主持的《收获》，而是寄给了别家刊物，这篇“大墙文学”的命运，我能不能复出于新时期的中国文坛，真是一个数学中的未知数X……

多年之后，我请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拍摄老从重返河北玉田代官屯，讲述自己一生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他的“回家”，题目就叫《仆仆红尘》。

作为路遥母校延安大学的代表、路遥的校友，我和全国各地的应邀嘉宾聚会北京，纪念当代著名现实主义作家路遥诞辰70周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影响深远的重要活动。

路遥现在头上有三个崇高靓丽的光环：茅盾文学奖、改革先锋、最美奋斗者。一个人连中三环，集其大成者，目前仅此一人。足见其价值和意义不同寻常。

路遥是1973年进校的中文系学生。他的上学也有点不同寻常，甚至带有传奇色彩。据王刚编著的《路遥年谱》记载，当年路遥报考大学的志愿一栏里，只写了三所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西北大学中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根本就没有申报延安大学中文系。北京和西安的两所高校由于他在“文革”中担任过县上一派群众组织的“司令”，而没有录取他。这在当时的政治生态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后来路遥上大学的问题转到了延安。当时延安不予录取有两条理由：一是北京、西安的高校都不录取，延安也不录取，无可非议；二是高校录取新生有一条潜规则，即考生凡不报考本校者，就视为不尊重本校，不愿上你这所学校。所以，不予录取也属正常。但是当时要录取路遥上延安，也有两条理由：一是路遥上大学前，延安中文系的部分师生，曾到延川县同《山花》编辑的同志举行过座谈会，了解到路遥有一定的文学才华，中文系就是要招收和培养那些热爱文学，又有一定才华的青年人学深造；二是延川县当时的县委书记，亲自到延安推荐，再三说明，并代表县委表示，路遥在“文革”中的问题，县公检法成立专案组进行了审查，认定路遥没有问题。县委也有明确意见，担任群众组织头头问题，不影响他上大学。因此，延安最后还是担着一点风险，录取路遥入学。按路遥自己的话说：“是延安收留了我”。何西来曾写文章说，如果延安不给路遥提供一个接受科班的高等文学教育的机会，“路遥的人生将是别样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路遥在延安中文系三年的勤奋学习，刻苦钻研，为他日后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早晨从中午开始》里说：“在大学里时我除了在欧洲文学史、俄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的指导下较系统地阅读中外各个时期的名著外，就是钻进阅览室，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乎全部重要的文学杂志，从创刊号一直翻读到“文革”开始后的终刊号。阅读这些杂志，实际上也就等于检阅了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的基本面貌、主要成就及其代表性作品。”因此，上延安大学是他一生和登上文学巅峰的重要转折点、关键期和里程碑。1988年延安大学首次校庆时，路遥的题词是“延安啊，这个温暖的摇篮”，显示了他对延安的深情厚意。但是，长期以来对于这方面的情况，过去很少披露，鲜为人知。一些媒体和舆论界，把路遥三年大学时代的经历边缘化，避而不谈，甚至被一些杂音所淹没。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对路遥不公平。幸好今年4月份，新华出版社主动约稿，让我们撰写一本《路遥的大学时代》，由我和厚夫牵头，组成5人写作班子，计划明年出版。之前我们还编辑了一本《路遥与延安大学》，新华出版社最近通知该书将于11月出版发行。相信通过这两本书，可以找到路遥何以由一个初中毕业生成为一个著名作家的部分答案。

古人讲，“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无伟男”。事实证明，别的不说，就以他准备和创作《平凡的世界》为例，足以说明路遥的奋斗精神是如何的顽强不屈，愈挫愈勇，锲而不舍，终获成功。令人震撼感动，肃然起敬！

众所周知，路遥在他八十九岁时，就对自己的人生作了规划和设计，那就是要在40岁以前做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就是他后来创作的那部以青春和生命作抵押的作品《平凡的世界》。这部书分为三部六卷100万字，人物近百个。时间跨度从1975年到1985年。然后他抱着“义无反顾，是刀山也要过去”的决心进入准备阶段，耗时3年，连闯“四关”，即读书关、背景材料关、深入生活关，最后进入创作关，又历经3年，才于1988年5月25日，最后完成这部100万字的鸿篇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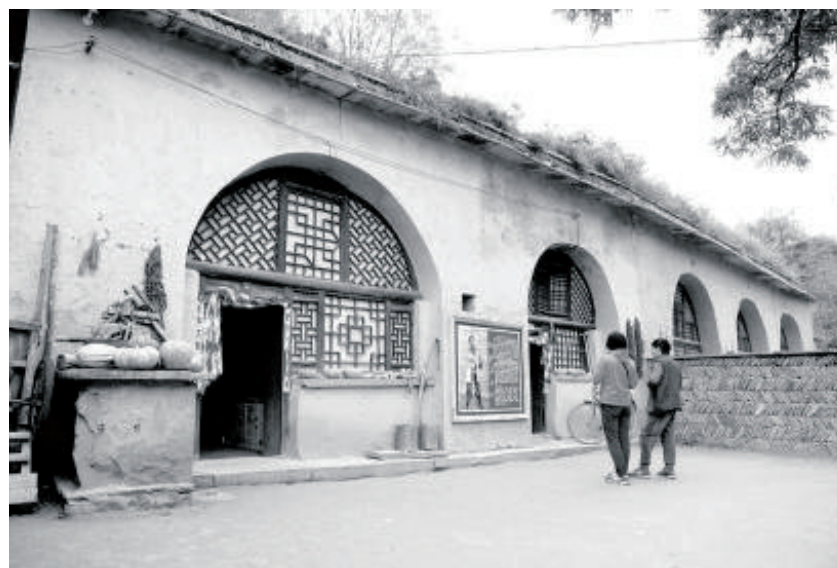
凡是读过《早晨从中午开始》这本书的人，而且是有良知、有理性的人，都应该知道路遥在这3年准备、3年创作的特别艰难而拼命的6年时间里（不要忘记，当年他才30多岁），所付出的青春和生命的代价，是常人难以想象和达到的。后来他回忆那个时候，“写作整个进入狂热状态，身体几乎不存在；生命似乎就是一种纯粹的精神形式，日常生活变为机器人性”。“写作紧张时，常常忘记吃饭，一天有一顿也就凑合了。”“为了约束自己的意志，每天的任务限制得很死，完不成就不上床休息了。写作时间实际上成了牢房，而且制订了严厉的狱规，决不可以犯规”。“躺在床上，有一种生命即将停止的感觉”。就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天晚上还要阅读读夫·托尔斯泰50多万字的通信录。“寻找回答精神问题的答案，寻找鼓舞勇气的力量。”他鼓励自己，“只要没有倒下，就该继续做”。直至全书写完，他把圆珠笔扔了出去，照了照镜子，看见了一张陌生的脸，两鬓竟然有了那么多的白发，整个脸庞老得像个老人，皱纹横七竖八，而且憔悴不堪，他看见自己泪流满面。即使这样，路遥还是无怨无悔地说：“生活就是这样，有得必有失。为某种选定的目标而献身，就应该是永远不悔的牺牲。”

正是因为这样，路遥在获得茅盾文学奖、改革先锋称号之后，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这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我们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路遥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是短暂而辉煌的，是贫穷而富有的，是平凡而伟大的！

（本文为作者在纪念路遥诞辰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略有删节）

奋斗是路遥人生的主旋律

□申沛昌



位于延安市延川县延川镇郭家沟村的路遥故居

原上草

臧克家